

# 毛泽东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和确立

张廷广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既有国内外重要思想渊源,又有坚实的革命实践基础。毛泽东在经历了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阶段、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形成阶段后,正式提出和确立了社会主要矛盾范畴。这一范畴的提出和确立是对古今中外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思想的继承和丰富,对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深化对基本国情的认识、明确和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意义重大。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思想渊源;实践基础;意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4-0009-10

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处于主要位置和居于统摄地位的矛盾<sup>①</sup>。它影响和制约着其他各类社会矛盾的存在方式和化解途径,从而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状态和面貌。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各个阶段的基本国情、明确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制定和分析事关全局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工具”。它的提出和确立,是毛泽东在充分吸收前人思想成果并紧密结合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话语体系进行创新的结果。全面深入探究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相关问题,对于进一步厘清党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进程、分析和总结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演变规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一 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思想渊源与实践基础

### (一) 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是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提出和确立的主要思想渊源

中国古代思想家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过矛盾不均衡发展的问

题,但他们在关于君王治国、君民关系等问题的相关论述中常常蕴含丰富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例如,《韩非子·扬权》强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sup>②</sup>韩非子在这里认为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各种“问题”并不是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而是有的处于重要位置,有的处于次要位置,因而要抓住关键,要注意“执要”。《孟子·公孙丑下》强调:“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sup>③</sup>孟子的观点着重说明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并不是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是始终存在着“轻重缓急之分”的特点,即“天时”因素在战争中不如“地利”因素重要,而“地利”因素在战争中又不如“人和”因素重要。毛泽东对此类中国传统文史典籍有较为深入的阅读和研究,他在私塾读书期间阅读过《幼学琼林》等启蒙读本,对其中的“中流砥柱”“物极必反”等蕴含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成语以及“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等体现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名句都有深刻的印象,这些“成语”和“名句”后来“常出现在毛泽东的笔

收稿日期:2022-03-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1CKS013);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重大培育项目“新时代研究生思政课多元教学体系建设研究”(2020ZDJG004)

作者简介:张廷广(1987—),男,四川巴中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社会矛盾、党的建设研究。

①张廷广:《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百年经验总结》,《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②陈明,王青:《韩非子全译(上)》,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70—71页。

③《孟子》,万丽华等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6页。

端和口头,成为他的语言素材”<sup>①</sup>。同时,“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有《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礼记》《中庸》《大学》《朱子语类》《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左传》《汉书》《史记》《昭明文选》《昌黎先生集》《古文辞类纂》《读史方輿纪要》等文史作品”<sup>②</sup>。通过对这些中国古代思想家传统经典作品的阅读,毛泽东对于“矛盾”的相关论述以及关于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有了个人的理解。例如,毛泽东在阅读《朱子语类》中关于“大本”“小规”“枝叶”“根本”等具有明显的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表述后,在致黎锦熙的信中阐述“救国之道”的思想时,明确提出了“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sup>③</sup>等体现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观点。经考证,“毛泽东辩证法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碰撞的产物,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厚的中国传统辩证法元素”<sup>④</sup>。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关于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的相关论述还时常带有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但毛泽东对这些思想的学习依然成为他能够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关键条件之一,因为如果认为各种矛盾之间以及矛盾双方之间始终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那就不存在矛盾的主次之分,也就不可能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过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唯物史观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时,不主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均衡关系,而是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和经济基础的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在阐述经济领域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时,纠正了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等人将生产和消费

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等同起来、平衡起来看待的做法,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sup>⑤</sup>。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其中也蕴含了鲜明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可以说,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相关论述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在1920年就阅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sup>⑥</sup>,在1926年6月以前阅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sup>⑦</sup>,在1932年4月后的一段时间里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著作,在井冈山革命时期阅读过斯大林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书<sup>⑧</sup>,在长征途中阅读过列宁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sup>⑨</sup>,在1936年8月以前阅读过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和李达寄给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sup>⑩</sup>,在1936年11月—1937年4月仔细阅读过西洛可夫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sup>⑪</sup>,在1937年7月以前仔细阅读过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sup>⑫</sup>。这些关于政治经济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不同程度蕴含了关于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在阅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中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深刻影响,例如他在阅读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后,对列宁批判“左派”不要党的纪律和集中等事实上否定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做法极为赞同,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反对部分党员和红军坚持革命关门主义策略等否定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幼稚病”做法,主张革命过程中的矛盾具有非均衡性,认为“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sup>⑬</sup>。

①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哲学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②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一)》,《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6期。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④王南湜:《重估毛泽东辩证法中的中国传统元素——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视角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页。

⑥《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⑦《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⑧周溯源,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⑨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9页。

⑩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二)》,《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

⑪《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页。

⑫《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687页。

⑬《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可见,毛泽东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或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著作时确实深受蕴含其中的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影响,而“这种思想倾向是主要矛盾理论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思想材料”<sup>①</sup>。

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和确立是对矛盾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更是对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的突破性和创新性发展。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sup>②</sup>。因此,“矛盾”与“辩证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看成等同关系的两类“对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sup>③</sup>这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思想及其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十分熟悉,并深受其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构成了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两大主要思想来源,而後者的影响更为深刻,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

## (二)有效应对国内革命形势变化是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提出和确立的重要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面临着波诡云谲、形势严峻的国内外大环境,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又处于力量弱小的地位,使得党在开展革命活动和应对强大的敌人的过程中必须抓重点、抓关键,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既以此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以此确保革命各阶段取得胜利。毛泽东在应对国内革命形势变化的实践中很快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运用得炉火纯青,在革命各阶段都提出了蕴含“不均衡”“非对称”理念的“抓重点”“抓关键”等正确的革命策略或方法。像“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革命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等策略和方法,都是毛泽东在国内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的实践中形成和运用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体现和结果。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华北事

变发生以后,中华民族更是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上下必须形成抗击日寇的强大力量,因为打败军事力量比较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sup>④</sup>。但是,即便在“西安事变”结束以后,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仍然一度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sup>⑤</sup>。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进行较长时间的斗争之后,部分共产党员和红军面对不断激化的中日民族矛盾、面对中华民族日益处于危亡的境地,在工作重心的转变问题上一时还存有疑惑,甚至还存在着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富农等力量加入统一战线的情况,错误地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sup>⑥</sup>。其他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和民主人士中的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对国内形势“认识不清”的现象。这些情况在当时严重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亟需一个通俗化又言简意赅的范畴,来分析和明确国内所存在的纷繁复杂的矛盾及其地位,特别是明确中日民族矛盾在诸多社会矛盾中的地位,以此既帮助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民主人士更加认清国内严峻的形势,促使他们真心赞同和尽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帮助共产党员和红军更加明确工作重心的转移。

显然,能够承载起这些“重任”的最恰当的范畴只能是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因为提出和确立该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话语的重要创新,能够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整套民族革命理论提供坚实的支撑点和基础,从而进一步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民族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提升其他各种力量、各种群体信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革命理论的程度,最大限度吸引他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正如毛泽东在阅读《辩证唯物论教程》一书时所批注的那样,“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

①赵科天:《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追问——社会和谐核心论》,华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盾”<sup>①</sup>。另一方面,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能够为各种力量、各类群体分析各类社会矛盾的“存在秩序”和“演变轨迹”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即“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分析法,从而提升他们自身把握国内形势和明晰敌我态势的精准性,促使他们自身去发现敌对关系的主要对象、斗争的主要任务都已切实发生阶段性转变的事实,进而增强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自觉性。事实上,毛泽东在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和确立阶段就明确强调:“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sup>②</sup>可见,国内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的现实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又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提出了迫切需要,成为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正式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重要实践基础。

## 二 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基本历程

### (一) 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阶段

1927年7月以前是毛泽东逐渐形成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阶段。根据其思想演变的情况,可以将毛泽东形成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阶段以1920年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两个小阶段,即1920年以前的阶段和1921年到1927年7月的阶段。

毛泽东在1919年7月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首次使用了“矛盾”一词,即“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sup>③</sup>。但是,他在这里所使用的“矛盾”一词并不是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所说的“矛盾”。实际上,毛泽东在1920年以前更多地使用“差别”“抵抗”等词来表达与“矛盾的普遍性”相近似的意思。例如,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提出了“人世间一切事,皆因差别比较而现”的论断,同时也赞同“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的观点。与其矛盾思想尚处于萌芽阶段同步的是,毛泽东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在1920年以前尚处于形成中的前半段,在很多时候还带有萌芽性质,其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读书与治学方面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

倾向。例如,毛泽东主张在“博”与“约”的关系上要先追求“博”,在“中”与“西”的关系上要先注重“中”,在“普通”与“专门”的关系上要先讲究“普通”。二是德智体的关系方面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例如,毛泽东不认为“德行”“智慧”和“身体”三者处于同一地位,而主张“身体”比“德行”和“智慧”更重要,“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三是救国方面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例如,毛泽东反对从补缀、枝节方面采取救国措施,而是主张从根本性、关键性方面采取救国措施,其在这一阶段先后提出通过英雄人物特别是“奇杰”来救国、通过改造和普及体现“大本大源”的哲学救国以及通过“民众大联合”救国等主张。四是价值和利益追寻方面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例如,毛泽东主张“善”的价值要高于“恶”的价值、“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以“利我”为主而以“利他”为辅等。五是婚姻观念上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例如,毛泽东主张“夫妇关系”的中心在于“恋爱”,而不在于其余的附属物,强调在“婚制改革”方面最根本、最要紧的是打破“婚姻命定说”。

从总体上看,尽管毛泽东在读书与治学、德智体的关系、救国、价值与利益、婚姻观念等方面的论述里体现了一定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但与其在1920年以前发表的丰富论著和深邃的思想相比,毛泽东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着实还显得比较零星化、零散化。而且,毛泽东在这一时间段里所阅读的各类论著主要集中于《论语》《礼记》等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书籍以及诸如《原富》《民约论》《伦理学原理》等介绍西方“新学”的书籍,而其在1920年前后才真正接触和阅读《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唯心主义哲学和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对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影响较大。这导致其“差别”“抵抗”等与“矛盾的普遍性”相近似的观点以及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除了个别时候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状态外,绝大部分时候都打上了唯心主义的烙印。也就是说,毛泽东在这一时间段里所具有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无论是形成的基础还是思想本身,在一定程度上都还缺乏科学性。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本段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1921年到1927年7月是毛泽东形成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第二个小阶段。毛泽东于1920年冬天在世界观上基本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历史观上基本完成了由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在革命观上基本完成了由改良主义、激进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毛泽东的矛盾观也逐渐摆脱了唯心主义的痕迹而走向科学,不仅看到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真正从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明确使用“矛盾”一词。例如,毛泽东在形容民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两面态度”时采用了“矛盾惶遽状态”<sup>①</sup>的表述,在形容小地主这一农村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时采用了“矛盾的态度”<sup>②</sup>等表述。与形成科学的矛盾观相同步的是,毛泽东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在这一阶段基本形成,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毛泽东认为必须动摇地主阶级这个“坚实的基础”,否则就万不能动摇国内统治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统治“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sup>③</sup>。二是革命方式方法上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他认为改良的方式是一种不适合中国实际的“补缀办法”,而改造的方式才适合中国,应该“大规模改造”<sup>④</sup>,并认为激烈的共产主义方法“最宜采用”,采取社会政策的方法只是“补苴罅漏”,而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罗素主义等方法“永世都做不到”<sup>⑤</sup>。三是革命形势方面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毛泽东认为,“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sup>⑥</sup>,因而属于革命的民主派的共产党应该与同属于革命的民主派的国民党合作,并且应该与非革命的民主派合作。四是革命动力与敌人方面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毛泽东依据经济地位的不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对作为革命敌人的各阶级的反动程度以及对作为革命动力的各阶级的革命程度进行了非均衡的区分。

毛泽东在1921年到1927年7月这段时间里

所阅读的马列主义书籍越来越多,所接触和吸收的马列主义思想也越来越丰富和深刻,所参加的诸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多次领导工人的罢工活动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实践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一切使毛泽东在1920年基本完成科学转变的世界观、历史观以及革命观在这段时间里得以巩固并完全确立。因此,毛泽东在这一时间段里所阐述的矛盾观以及所形成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都建构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均衡发展倾向的发现或产生,既是毛泽东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重要表现之一,也帮助毛泽东打开了正确、科学认识社会现象的“闸门”,令他在认识与革命直接相关的最紧迫、最重要的那些问题上往往都具有明显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换句话说,毛泽东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方法和前提去认识各种革命因素和现象,形成了一个与革命直接相关的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倾向的“理论集群”。而且,毛泽东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在这一段时间里不再是零散化、零星化,而是贯穿和体现于他在各种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所写的各种重要文章中以及所参加的各种重要的实践活动中,为正式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

## (二) 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形成阶段

从1927年8月到1936年10月是毛泽东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的形成阶段。在这一时间段里,毛泽东在一系列革命实践中对矛盾的认识越来越走向深入,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涵盖方方面面的矛盾学说。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矛盾”术语已经相当频繁地出现于他所撰写的各种文章中以及所发表的各种讲话中。例如,“敌人内部有矛盾”<sup>⑦</sup>“阶级矛盾”<sup>⑧</sup>等表述都是其具体体现。而与“矛盾”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斗争”“冲突”等词汇用语和表达更是异常频繁,数不胜数。基于对矛盾的深入思考和认识,毛泽东在这一时间段里不再是仅仅具有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而是正式形成了矛盾不均衡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②《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⑦《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⑧《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发展的思想。其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经济发展方面不均衡。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会直接导致社会矛盾不均衡,是引起各种社会矛盾不均衡的最深层次的根源。二是革命道路方面不均衡。毛泽东依据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客观现实,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不均衡的,不能像俄国那样选择“城市—农村”式的革命道路,而是要选择“农村—城市”式的革命道路,即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三是战略战术方面不均衡。在战略方向上,毛泽东主张对强敌一方采取守势,而对弱敌一方采取攻势<sup>①</sup>,主张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避免“防御式的内线作战”,而要采用“进攻式的外线作战”战略<sup>②</sup>等;在战术上,毛泽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诀”游击战法和“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16字诀”运动战法<sup>③</sup>等。四是状态、因素发生转化体现矛盾不均衡。巩固根据地要将“敌人的攻势”转变为“敌人的守势”<sup>④</sup>、“经济建设”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必须让位和服务于“革命战争”<sup>⑤</sup>、民族资产阶级在严峻的民族危机下会由“不抗日”转变为“抗日”<sup>⑥</sup>等都是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形成“矛盾地位会发生转化”观点的具体体现。不同的矛盾之间的地位以及矛盾双方的地位发生转化是矛盾不均衡的重要体现,也是毛泽东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在这一时间段里所经历的革命实践活动真可谓是异常丰富,惊心动魄,既长期面临着严峻的阶级斗争,又日益面临着紧迫的民族革命;既经历过正确路线指引下的革命领导的顺境,又经历过错误路线指引下被剥夺革命领导权的逆境;既有过围绕根据地多次开展“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又有过因革命失利而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的低沉。在极其复杂和异常艰难的革命形势下亲身参加和领导的众多革命实践活动,不仅为毛泽东认识矛盾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生动素材,

也促使他更为深入地认识和思考各种矛盾的演变规律,从而尽量使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且,毛泽东在这一阶段集中深入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以及斯大林撰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马列主义的重要经典著作。通过对这些经典著作的仔细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哲学特别是列宁的认识论、辩证法思想、帝国主义论对正处于革命斗争最前线、最艰难阶段的毛泽东的影响越来越大。毛泽东正是在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矛盾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富有中国革命特色的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之所以说毛泽东的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在这一时间段里基本形成,是因为毛泽东基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态形成了革命道路不均衡、革命战略战术不均衡、革命状态和因素发生转化等在内的一套革命不均衡发展的理论体系。为了进一步明确革命任务,毛泽东在靠近这一时间段的末尾时已经使用“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sup>⑦</sup>“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sup>⑧</sup>等表述。可见,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在这一阶段的末尾已经是一件呼之欲出的事情了。

### (三) 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提出和确立阶段

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8月是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时期。与前一阶段相比,毛泽东的矛盾学说在这一阶段越来越走向成熟、完备和深化,不仅继续创新和发展了之前所形成的革命矛盾学说,而且从哲学上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矛盾学说。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正是在这两类矛盾学说的创新和发展中得以正式提出和确立。

社会主要矛盾范畴能在这—时间段里得以最终提出和确立,除了受到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外,还明显受到苏联哲学思想的影响。由苏联哲学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毛泽东在这一阶段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产生了重要的直接影响,而尤其以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②《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④《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⑤《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37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前者所产生的影响最大、最直接。其直接影响主要不是来自于哲学著作中所系统论述的“对立物相互渗透”“对立物相互转化”<sup>①</sup>“矛盾不均衡”<sup>②</sup>“内因是主导”<sup>③</sup>等体现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本身,而是主要来自于哲学著作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矛盾”以及与其意义相近的“根本矛盾”“主要的决定的矛盾”等表述本身。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章有关于“根本矛盾”的表述<sup>④</sup>,第七章有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sup>⑤</sup>和关于“主要的决定的矛盾”的表述<sup>⑥</sup>等。这些表述为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提供了原初的经典文字表述或表达上的宝贵借鉴和参考。如果没有苏联哲学家们提供的这些借鉴和参考,毛泽东当然也会提出和确立与“社会主要矛盾”意思相近或者相同的范畴,但这一范畴的名称可能就不一定会叫“社会主要矛盾”,而是可能叫“最高矛盾”或“最重要矛盾”等其他表达。而且,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撰写的相关文章来看,他在使用“主要矛盾”及其与之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表达方面确实打上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痕迹”。例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表达“主要矛盾”的意思时,偶尔会用“根本矛盾”的表达来代替“主要矛盾”的表达<sup>⑦</sup>。这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将“主要矛盾”与“根本矛盾”等表达含混运用的情况极为相似。但是,苏联哲学家们只是在其所举的例子中提到了“主要矛盾”以及与其意义相近的表达和表述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sup>⑧</sup>,而对于其所包含的内容、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所具有的变化规律等都没有展开论述,即“主要矛盾”以及与其意义相近的表达和表述在苏联哲学家们的思想中还只是抽象的、尚处于需要完善和发展的概念。苏联哲学家并没有真正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因此,尽管毛泽东直接借鉴和参考了苏联哲学家们关于“主要矛盾”以及与其意义相近的表达和表述,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直接将其生拉硬扯地运用到对

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之中而无任何创新。相反,毛泽东才是真正赋予“主要矛盾”以真实丰富的内容、确切的内涵以及真实演变规律的第一人。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以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和确立了社会主要矛盾范畴。

毛泽东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先后阅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数遍,其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苏联哲学家们关于主要矛盾的相关表述的直接影响和启发,在所写的批注中初步阐述了对主要矛盾的一些看法。例如,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不平衡发展”“中日矛盾在九一八后成为主要矛盾”等判断<sup>⑨</sup>,并明确将矛盾分为“过程中主要矛盾与若干其他次要矛盾”<sup>⑩</sup>。不仅如此,他还在批注中初步揭示了主要矛盾的内涵和地位,即“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规定各次要矛盾的发展”<sup>⑪</sup>，“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sup>⑫</sup>。尽管毛泽东在批注中关于主要矛盾的看法和表述还不是那么准确和完备,但从思想实质来看,这些看法和表述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初步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了。从此,他就越加频繁地运用这一范畴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革命现状。例如,他在1937年3月23日开始召开的延安会议第一项议程的讲话中有“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地位”“政策变化是以这一主要矛盾为主要的根据”等提法<sup>⑬</sup>。他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sup>⑭</sup>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统一战线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全国民众的情况变化、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军阀割据与内战情况的变化等各方面情况发生变化之间的关系。当然,毛泽东有时候对“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表述还不是太到位。例如,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

①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版,第291页。

②《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页。

③《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7页。

④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版,第282页。

⑤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版,第298页。

⑥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等译,笔耕堂书店1932年版,第299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

⑧《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页。

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⑩《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⑪《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⑫《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⑬《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页。

⑭《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页。

15日发出的《告全党同志书》中还有“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sup>①</sup>的提法。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所做的批注为其写作《矛盾论》作了直接的准备<sup>②</sup>。但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不仅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进行了发挥和深化,而且对主要矛盾的阐述比这之前的相关论述更深刻、更科学、更完备。他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明确将主要矛盾视为矛盾不均衡性的根本体现,将主要矛盾归结为矛盾的特殊性方面,而且阐述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相互转化关系,还首次对主要矛盾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即主要矛盾是存在于“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sup>③</sup>的矛盾。概念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sup>④</sup>的理性认识,因而对“主要矛盾”概念的科学界定就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正式提出和确立。或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在这一时间段里还没有完整地使用“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达,即还没有将“社会”与“主要矛盾”真正连在一起使用,因而他在这一阶段还没有真正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因为哲学是一门方法论意味十分浓厚的社会科学,将哲学上的“主要矛盾”概念和范畴与社会现实的分析相结合所得出来的“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而且“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的表述也正是毛泽东考察当时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而得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因此,毛泽东在这一时间段里正式提出和确立了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是确定无疑的。

### 三 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重大意义

#### (一) 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矛盾学说中具有明显的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但他们没有专门论述矛盾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本身,也就还没有正式形成矛盾不均衡发展思想,甚至还没有对矛盾“不均衡”的程度进行理论上的系统探讨和区分。首先,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是对矛盾不均衡发展问题

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重要体现之一,突破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不均衡”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矛盾不均衡发展的思想倾向上的做法,对社会矛盾的不均衡程度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和区分,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有效把握社会矛盾不均衡程度且可感可知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这一理论分析抓手和方法。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各自的论著中虽然涉及矛盾特殊性问题,但其探讨和论述都比较零散化,而且缺乏关键范畴统领矛盾特殊性理论的内在联系。但是,毛泽东是在全面分析“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sup>⑤</sup>的基础上,即在全面、系统认识矛盾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和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换句话说,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矛盾特殊性原理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过程。而且,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和确立在整个矛盾特殊性理论中属于极为关键的范畴,它与社会次要矛盾范畴一起构成了一对统领社会矛盾特殊性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其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特殊性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更加深入认识和把握矛盾特殊性原理。最后,毛泽东在革命年代提出和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话语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总体表达社会矛盾地位和秩序的关键性话语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构建革命形态“社会矛盾”话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与跟社会矛盾相关的其他概念一起在理论上明晰了中国革命“出场”大环境、各类矛盾的状态和激化程度,进而从理论上更加明晰了目标、敌人、动力等革命基本问题。而且,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在和平建设年代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各个阶段建构与时俱进的“社会矛盾”话语的关键理论支撑和核心范畴、核心概念。因此,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范畴不仅在当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①《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页。

②《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 （二）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有助于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比较完备地总结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矛盾及其辩证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毛泽东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将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两对社会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范畴的内容加以提出。例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sup>①</sup>显然，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其属于贯穿人类一切社会形态始终的最为抽象的动力<sup>②</sup>。正因为如此，尽管社会基本矛盾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都在发挥实际作用，但我们往往难以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甚至可能将社会基本矛盾当作“不变体”。特别是处于相对比较漫长的某一社会形态内部时，我们更难以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情况。然而，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并将其运用于分析和判断我国各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是对社会基本矛盾在具体社会形态下的具体国家及其具体发展阶段中以具体化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是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变化的必然结果。人们正是通过不断努力化解各个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使其发生转化，来不断调适社会基本矛盾内部要素由“不适应”转向“适应”，以此推动社会基本矛盾不断向前运动，从而不断把社会形态由较低阶段推向更高阶段。因此，我们通过把握各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能更好地把握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情况。

## （三）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有助于深化对基本国情的认识

基本国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综合、整体发展情况的基本性质以及所处方位的判断和描述。在革命年代，“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sup>③</sup>；在和平建设年代，认清中国的国情，同样是认清一切发展问题的基本根据。但是，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认清中国在不同

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往往并不容易。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sup>④</sup>在这里，“事物的性质”实际上就是指事物基本的本质情况；“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指事物的主要矛盾。如果将“事物”对应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那“事物的性质”就是指基本国情，而“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就是指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是说，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恰恰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一方面，对我国在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内的社会主要矛盾从总体上作出准确判断，对于我们科学把握和准确认识这个大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正是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从总体上准确判断为“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sup>⑤</sup>，我们才能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国情作出更加准确、更加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对我国在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内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阶段化的精准判断，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在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内不断呈现出新特征以及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正是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我们才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现的诸多新特征以及基本国情在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发生了新变化有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

## （四）提出和确立社会主要矛盾范畴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明确和完成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必须明确自身的中心任务，并尽最大努力完成。习近平总书记于2022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sup>⑥</sup>社会主要矛盾范畴的提出和确立能直接为党在各个时期明确和完成中心任务服务。自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要矛盾范畴分析我国的革命问题以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②张廷广：《从多维度审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重大意义》，《邓小平研究》2020年第1期。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⑥习近平：《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人民日报》2022年1月12日。

来,确定党的中心任务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就会确定什么样的中心任务。确定各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目的之一,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又是中国共产党科学确定各阶段中心任务的直接依据和参照。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时,其确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为“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时,其确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显然,中国共产党要完成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就需要不断出台和完善有助于中心任务完成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而社会主要矛盾恰恰为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提供了关键参照物。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意味着党要在接下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为满足人民对以需要的种类多元化、需要的层次升级化、需要的风格个性化为基本内涵<sup>①</sup>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奋斗,使党紧密围绕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制定和出台或继续制定和出台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而这些方针政策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的基本保障。

## Mao Zedong's Proposal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Category

ZHANG Ting-gu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proposes and establishes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category, which has not only important ideological sour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ut also a solid foundation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 Mao Zedong formally puts forward and establishes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category after experiencing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formation stage of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contradiction imbalance, and the formation stage of the thought of contradictory imbalance. Mao Zedong's proposal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 category, which creatively develops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contradictory imbalanc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herits and enriches Marxist contradictory though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rasp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asic contradictions,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clarify and complete the Party's central task in differently historical stages.

**Key words:**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Mao Zedong; ideological origin; practical basis; significance  
(责任校对 朱正余)

<sup>①</sup>张廷广:《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三重内涵论析》,《海派经济学》2021年第1期。